

赋权妇女：全球农业粮食系统转型的核心问题

阅读提示

在农业粮食系统全球化的大趋势之下，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已成为该系统善治与转型的一个核心。放眼世界，在转型的“阵痛”期，农业粮食问题与性别不平等等诸多全球挑战正加速交汇。一个更高效、更具包容性与韧性以及更可持续的全球农业粮食系统的构建势在必行。本文从妇女在全球农业粮食劳动场域中的作用与劣势的反差、全球性挑战对弥合性别鸿沟的干预影响入手，为缩小性别差距以及推进妇女赋权的未来之路提出了策略建议。



印度妇女在田地里工作。



巴基斯坦，一名妇女抱着女儿与其他妇女一起在田间劳作。



吉尔吉斯斯坦巴吉什的农村家庭，母亲正在为孩子们准备餐食。
图片均来源于粮农组织

■ 胡玉坤

在农业粮食系统全球化的大趋势之下，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已成为该系统善治与转型的一个核心。放眼世界，在转型的“阵痛”期，农业粮食问题与性别不平等等诸多全球挑战正加速交汇。按当下的发展态势，距离“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全球愿景中的目标2（消除饥饿）和目标5（实现性别平等）实现的希望愈发渺茫。一个更高效、更具包容性与韧性以及更可持续的全球农业粮食系统的构建势在必行。

妇女在全球农业粮食劳动场域中的作用与劣势的反差

妇女是全球农业粮食系统难以忽视的一支主力军。须知，全球36%的女性劳动者和38%的男性劳动者在农业粮食体系中就业。2011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首次发布了《妇女参与农业：缩小发展中的性别差距》的旗舰报告，开创性地评估了全球妇女在农业中的地位和农业生产率方面的性别差距。2023年4月，联合国粮农组织又推出了《妇女在农业粮食体系中的地位》，将研究视野延伸到了更广泛的农业粮食系统。这一拓展得以透视妇女

群体的更大参与范畴，也折射了与时俱进跟进全球农业粮食系统的转型。

妇女在农业粮食系统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却滞留在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低端。在低收入国家，妇女更有可能在农业粮食系统就业。以南亚为例，71%的女性劳动力聚集在这个系统，而男性为47%，两者相差24个百分点。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女性的占比(66%)也高于男性(60%)。农业粮食系统既是这些地方妇女就业的主渠道，也是其赖以生存的一个主要生计来源。尽管如此，妇女扮演的角色往往是边缘化的。被锁定在小块地上种植庄稼和饲养家畜的“小农”中的妇女约占40%~60%。

在农业粮食系统的非农部门，由于劳动力市场的种种歧视，妇女通常承担非固定、非正规、兼职、低技能或劳动密集型的工作。例如，在全球水产养殖和渔业部门，妇女持有的全职职位仅占15%，而在加工的兼职工作中占71%。不单妇女的工作条件比男性更糟糕，因职业藩篱，在农业的工资就业中，男性每赚一美元，妇女只能挣82美分。总体而言，妇女难以突破或告别劣势处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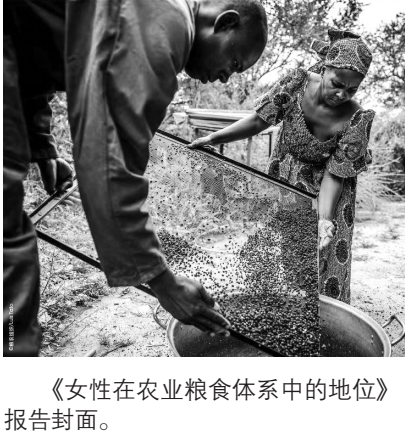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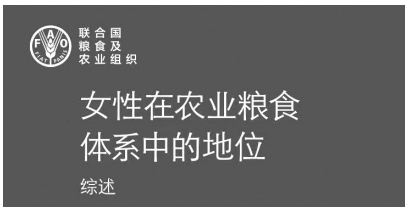
全球性挑战为弥合性别鸿沟的干预投下了阴影

近年来，缩小性别鸿沟的努力避

逅了接踵而至且互为交叠的全球性挑战。在气候变化、新冠疫情及地区冲突的连锁效应之下，各地妇女均遭受了冲击。在新冠疫情第一年，全球农业粮食系统的非农部门就业的妇女中，22%丢掉了工作，而男性仅为2%。2021年，至少有9.39亿15岁及以上的妇女经历了中重度到重度的粮食不安全，而男性为8.13亿。两性粮食不安全的差距从2019年的1.7个百分点扩大为2021年的4.3个百分点。而且，新冠疫情肆虐的“长尾效应”并不能立刻消失。气候变化同样增添并放大了农业粮食系统妇女发展的障碍。贫弱妇女常常别无选择地诉诸短期的应对策略，比如粮食匮乏之际减少自己进餐次数和数量。这势必牺牲其应对气候冲击和压力源的长期韧性。

在全球性挑战的交互影响之下，弥合性别鸿沟的一些干预几乎停滞，某些方面非但没有进步反而出现了倒退。由于缺乏替代性生计，农业劳动力的女性化险境依旧十分凸显。但由于许多妇女无缘获得必要的资源、技术、土地所有权以及与市场对接的机会等，管理同等规模农场，妇女和男性土地生产率的性别差距达到了24%。农业粮食系统性别不平等的系统性障碍仍然难以撼动。歧视性的社会机制、根深蒂固的性别规范及不平等的性别权力关系等，都是其背后的主要驱动因素。

“社会性别主流化”是一个举世瞩目的全球战略，但实际成效却并不尽如人意。基于对68个国家的研究揭示，75%以上的农业政策承认妇女的作用



《女性在农业粮食体系中的地位》报告封面。

和/或她们面临的挑战，但仅有19%将性别平等或妇女权利作为明确的政策目标。妇女的诉求和优先关切事项在政策和决策中“缺席”就不足为奇了。

赋权妇女乃至缩小性别差距的上策

盘点过去十多年的进展，《妇女在农业粮食体系中的地位》报告一脉相承地发出了促进性别平等的明确信号，特别是重弹了妇女赋权的“主基调”。经大量实践检验，更加精准而有效地向妇女赋权倾向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硬道理”。

在农业粮食系统，妇女赋权的行动更为奏效。粮农组织连同其姊妹机构——世界粮食计划署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等国际组织等，都不约而同倾力于妇女赋权。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为此专门开发了一个颇为实用的农业中妇女赋权指数。数据表明，瞄准赋权妇女的项目比那些只将社会性别纳入主流的项目有望带来更多益处。

得益于妇女赋权的不懈努力，各地妇女承担了愈来愈多非农经济角色。拥抱数字技术的女农也越来越多。2017至2021年，中低收入国家在使用移动互联网方面的性别差距从25%缩小为16%。开立银行账户方面的性别差距从9个百分点缩小为6个百分点。毋庸说，增强妇女自己做出决策之能力和资源的赋权干预更接地气。

一些科学证据表明，在缩小小农田生产率和农业粮食系统就业工资上的性别差距，有望为整个社会带来巨大效应。此举将使全球GDP提升1%，即接近1万亿美元。换句话说，这将使全球粮食不安全降低约2个百分点。倘若半数的小规模生产者受益于聚焦赋权妇女的发展干预，这将大幅提升5800万人的收入并增加2.35亿人的韧性。赋权妇女可观的社会经济

效益由此可略见一斑。

尽管半数以上农业和农村发展双边援助项目已融入了性别视角，但遗憾的是，在方案设计将社会性别视为根本性问题的仅占微不足道的6%。生活在夹缝中的一些贫弱妇女依旧十分脆弱，境遇堪虞。很显然，性别主流化也好，赋权也罢，都须加倍努力更上一层楼，行之有效的妇女赋权规模的扩大显得更为急迫。

推进妇女赋权的未来之路

有鉴于限制妇女平等参与农业粮食系统并造成性别差距的驱动因素植根于不易撼动的歧视性政策法律、制度结构以及社会规范等。更为广泛的兼顾治本和治标的赋权方法必不可少。

第一，国际和国家政策的支持必不可少。唯有不断优化具有性别敏感性的农业粮食政策，才有可能助力“性别盲”的各种变革，特别是扭转妇女领导权和决策权中的持续“缺席”，进而充分发掘广大妇女的巨大潜力。

第二，明确针对刻板印象、性别偏见及歧视性社会规范与规则等结构性限制的性别变革方法被证明颇富成效。我们不应忘记，社会性别与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年龄、族裔或身处偏远等其他社会不平等往往重叠交错。毋庸说，这有待于从社区到国际层面所有利益相关方坚定不移的共同发力。

第三，强化社会保护方案。在一个更加不确定、不安全和不平等的世界里，社会保护事关贫弱妇女在高风险环境下的福祉和发展，亦有助于她们从重大冲击中尽快恢复过来。

第四，强化以群体为本的方法。当灾难压顶或已陷入灾害泥潭时，一盘散沙的小农尤其是女农要是孤立无援的话，仅靠单打独斗绝无可能扛住压力。群体的力量有益于助推群体赋权及抗击冲击的韧性。

第五，确保务农妇女获得改良种子、土地、肥料和灌溉等农业资源以及信贷、教育、培训、技术咨询和数字服务的平等机会，有助于她们更好地管理农场。加快补齐这些短板和弱项，整个农业部门的产量都将会水涨船高。

第六，有效提高妇女的生产率还有赖于减轻其无偿照料和家务劳动的沉重负担。普惠型的儿童保育服务对于母亲保住非农职业生涯并获得较高报酬能起杠杆作用。

概言之，人类要“跑赢”减少贫困和饥饿之战，改善饮食、营养和粮食安全以及实现更公正、更有韧性和可持续的农业粮食系统，投资于妇女赋权的必要性和正当性是毋庸置疑的。农业粮食系统的转型反过来亦有助于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

（作者为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气候适应与韧性的底层逻辑研究”（批准号：22BSH04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马克思是性别盲吗？——马克思性别观的再认识》

作者：吴华眉 张英荟

在当代西方女性主义学者中一直存在着关于马克思是否“性别盲”的争论。分析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可知，马克思并不是“性别盲”，其性别观深刻隐藏于对人与自然、人与关系的辩证思考中，突出体现在对劳动分工与家庭分工的深入批判中，直接呈现在对社会变革主体的积极思考中。以马克思的性别观为理论工具，可以看到，当代中国的性别平等事业处于最好的发展机遇中，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同时，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因而也存在着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现象。基于此，本文作者认为应该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认识到女性发展对社会进步的重要性，从社会关系中构筑女性全面发展的社会土壤，并激发广大女性的历史使命感，推进女性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和新作为。

来源：《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性别分工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研究》

作者：杨华磊 王嘉昊 刘雅静

面对当前逐年攀升的离婚率，一些学者认为是女性走出家庭，参与工作，接触到更多异性和有更高的自我实现所致，那相比权力夫妻（双方都有工作），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婚配模式下婚姻就会更稳定吗？为回答这一问题，文章基于2017年与2018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混合截面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相比“男主外女主内”的婚配模式，权力夫妻有着更高的婚姻稳定性。其中的机制是，两方都工作会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贫贱夫妻百事哀，贫穷会引起紧张，损害婚姻；在家庭内部性别不平等下，不工作的女性将承担更多的家务，更多的家务将引致女性更容易焦虑；女性参与工作意味着有更多的社会支持和社交参与，不会把过多注意力集中在男性身上，健康的情绪和更多的社会支持有利于婚姻稳定；婚姻是一种匹配，双方都有工作意味着势均力敌相互依赖，有更加相似的适配价值，相似通常使得婚姻更稳定。进一步对比分析还发现，“男主外女主内”比“女主外男主内”的婚姻稳定性要高；与夫妻双方都无工作的家庭对比，“夫妻双方都有工作”与“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更稳定，而“女主外男主内”的离婚风险最高。

来源：《西北人口》

《男女有别：中国人名字中的性别倾向及其变迁》

作者：许琪 陈默闻 曹云鹤

名字既是传递性别信息的重要载体，又蕴含着所属时代的性别文化特征。本文作者使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发现中国人的名字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分化，但这种分化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有所减弱。随着时间的推移，女性名字同时出现了中性化和男性化的趋势，而男性名字只是出现了中性化趋势，且在中性化的速度上慢于女性。一方面，中国社会文化包容性的增强和性别观念的进步是推动名字性别倾向变迁的重要因素。但另一方面，名字的性别倾向也深受男孩偏好和儿女双全等传统生育偏好的影响。在生育率下降的背景下，家庭的实际生育状况与生育偏好不符是推动名字性别倾向变迁的重要原因。

来源：《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农村妇女参与基层治理的路径探讨——基于社会工作介入H村社区建设的研究》

作者：魏开琼 李婷

通过社会工作介入基层妇女参与社区建设的实践是探讨妇女参与基层治理的有效路径。通过分析农村社区治理主体关系的构成与运行情况，设计出符合实际情况、满足现实需求、解决妇女参与困境的服务方案，能够有效激发妇女参与社区建设的潜能。本文作者认为坚持党建引领，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建立以村“两委”、村民小组、社会工作组织、村民代表、妇女等多元治理主体参加的农村社区治理平台，有助于基层社会治理有序运转，促进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提升。

来源：《理论月刊》

（白晨 整理）

聚焦新的社会阶层与中国式现代化

阅读提示

以“新的社会阶层与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的第二届新时代新的社会阶层发展学术研讨会日前在上海举行，大会举行了《中国新社会阶层发展研究报告No.1——结构化、组织化与实践创新》发布仪式。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的社会阶层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职能部门的领导、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等深入探讨了新时代新的社会阶层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关的理论、实践和政策问题。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白晨

2023年5月20日至21日，第二届新时代新的社会阶层发展学术研讨会在上海成功举办。本次会议的指导单位是上海市委统战部 and 上海大学，由上海新的社会阶层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和长宁区委统战部共同主办。

第二届新时代新的社会阶层发展学术研讨会以“新的社会阶层与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的社会阶层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职能部门的领导、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等130余人参加了本次学术研讨会。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上海新的社会阶层研究中心主任欧阳华主持开幕式和主旨演讲。

研讨新的社会阶层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关理论、实践和政策问题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一支蓬勃发展新活力的重要力量，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一支生力军。上海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研究中心成立两年多来，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广泛总结经验，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创新发展提供了积极支持和帮助。

中央统战部六局负责同志在致辞中指出，此次会议的举办将为统战干部、专家学者、代表人士研讨交流新的社会阶层课题搭建重要平台，有助于深化对新的社会阶层发展规律的理解，对推动新

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创新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上海市委统战部二级巡视员、上海新的社会阶层研究中心主任李霞在致辞中表示，本次会议是上海新的社会阶层研究中心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务实举措，是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的生动实践，也是研究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优势作用，助力全国和上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探索。

上海大学伟光学者特级岗特聘教授、上海新的社会阶层研究中心顾问李友梅在致辞中表示，加强对新的社会阶层的研究，可以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经验认识的理念和总结，可以深化中国转型社会学研究范式创新研究，也能够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深入探究。

为了深入研究新的社会阶层发展，做好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本次学术研讨会设置了“新的社会阶层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研究”“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重要作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新的社会阶层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研究”三个分论坛。

与会专家学者与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一致认为本次大会对于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深入探讨新时代新的社会阶层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关的理论、实践和政策问题，为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

战工作提供理论借鉴具有积极意义。

发布《中国新社会阶层发展研究报告No.1——结构化、组织化与实践创新》

大会举行了《中国新社会阶层发展研究报告No.1——结构化、组织化与实践创新》的发布仪式，仪式由中国社会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谢春光主持。在新书揭幕仪式之后，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上海新的社会阶层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海东对新书内容进行了具体介绍。该书是上海新的社会阶层研究中心研究团队的最新成果，作为中国新社会阶层发展研究系列报告的第一本，该书以新社会阶层的结构化、组织化与实践创新为主题，综合运用理论研究、量化研究和个案研究的方法全面呈现了新时代我国新社会阶层的新发展、新变化和新经验。未来，上海新的社会阶层研究中心将继续扎实推进新的社会阶层的理论研究、政策研究和实践研究。

围绕《中国新社会阶层发展研究报告No.1——结构化、组织化与实践创新》，各位专家学者由此延伸思考，纷纷进行了精彩的主旨演讲。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上海新的社会阶层研究中心顾问李培林研究员以“加强新就业群体视角的新社会阶层研究”为主题发表了演讲，他提出加强新就业群体视角的新社会阶层研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之问、时代之问，并在高度概括“新就业群体”五大特征的基础上